

万里茶路话



常士宣 常崇娟 著

- 晋商茶路
晋商经营之道
儒商常家
明清山西商人研究
回望晋商

山西出版集团
山西经济出版社

晋商书系



□ 儒商常家

□ 晋商茶路

□ 晋商经营之道

□ 明清山西商人研究

□ 回望晋商

万里茶路 常家话

常士宣 常崇娟 著

山西出版集团
山西经济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万里茶路话常家 / 常士宣，常崇娟著。—太原：山西经济出版社，2009.8
ISBN 978 - 7 - 80767 - 219 - 7

I . 万… II . ①常… ②常… III . ①茶—商业史—山西省
②家族—史料—榆次市 IV . F729 K820.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9) 第 148415 号

万里茶路话常家

著 者：常士宣 常崇娟

责任编辑：任 冰

装帧设计：弘成图文

出版者：山西出版集团·山西经济出版社

社 址：太原市建设南路 21 号

邮 编：030012

电 话：0351 - 4922133 (发行中心)

0351 - 4922085 (综合办)

E - mail：sxjjfx@163.com

jingjshb@sxskcb.com

网 址：www.sxjjcb.com

经 销 者：山西新华书店集团有限公司

承 印 者：山西省美术印刷厂

开 本：787mm × 1000mm 1/16

印 张：19.5

字 数：330 千字

印 数：1 - 3000 册

版 次：2009 年 8 月 第 1 版

印 次：2009 年 8 月 第 1 次印刷

书 号：ISBN 978 - 7 - 80767 - 219 - 7

定 价：36.00 元

中国晋商文化研究基地系列丛书

编委会

主任 王建林 王继堂

副主任 张增翔 王琳玉

赵凌中

委员 刘锦萍 王新元

赵继光 王铎武

常忠武 常士继

常士宣

特别鸣谢 三晋文化研究会

常家庄园管委会

晋中学院人文社科研究中心

陈模诗 阎宝贤 书

史尊晉商為古賢茶路常家亦無前
南船搖檣路漫漫北漠駝峰淚斑斑
票號銀響百商樂武夷香飄千里歡
俄通商道恰克圖茶飲傳世功不凡

陳模先生詩稿存稿於右 宝賢書

序

自明清以来，社会生产力有所发展，社会商品增多，交换之需日迫，遂使商事日兴。其间晋省贾客以盐、铁、粮、布起始，纵横江南，行抵塞北，财势益巨，遂至结帮。而内行自励，外联图强，数百年间独步天下。

晋商以账局、票号布点南北，汇通天下，执举国金融牛耳，令诸多商帮仰目而视；其使南茶北运，纵行华夏，势及俄京，钟情外贸一隅，开拓万里茶路，亦令闻者动容。近年来，海内外专家学者多有关注，相关书文难以数计，但以票商研究居多，论之甚详，而茶贸虽为大宗，盖因材料较少，鲜有叙及。当年辉煌一时的万里茶路，更因在文献、方志中难觅其踪而隐没多年。

榆次车辋村常氏家族，其先人最早行商于漠北草原。后以恰克图为基地，以茶为主开展对俄贸易，历 200 余年，被称为“外贸世家”。后其家族转重文化，发展教育，文人、学者层出不穷，影响三晋，波及全国。自“常家庄园”旅游景点开放以后，更加引起多方关注。本书作者常士宣、常崇娟父女为该家族十六世、十七世传人，正宗茶商后裔。其从幼时起耳濡染诸多传说、传言，后又查阅《常氏家乘》等多种资料，对茶路、常家研究多有心得。但所获、所知零散无系，无从勾线，更难成幅，遂使下决心对茶路旧迹作实地考察。常先生不顾年高路艰，历时半年，行程万里，



寻觅旧籍，查访知情，搜集资料，归类分纳，详加辨析，案头劳神，写就鸿篇。

本书重在茶路，同时述及晋商前因后果，思往述来，着重于过去少有触及的路线考察，从古老的官道、驿道、便道间，最终确定商道所在。不论是武夷闽山、鄱阳、洞庭、唐白窄水、三鸦古道、太行羊肠、雁门黄沙、漠北驼道都做了详尽描述，对当地人文、历史、经济、民俗等做全方位的展现。而茶商的行踪又能自然地穿插其间，使读者对一路辛苦的茶队，有如身临其境的体验。

抚今思昔，感慨万千，悠悠茶路，发人深思。它缘起，而兴，再衰，终亡，有如一曲悲壮的长歌，留给后人无尽的感叹，其在历史、社会、经济、民生等诸方面影响、教训值得研究者长久探讨。在本书中，作者回溯历史，多探索而不擅做论定；考商路，多事实深究而不做悍定；绘地域风情，绝少巧词艳描；发由衷感慨而收放有度，视角独特，但不强侵客思。而文笔古朴欠婉，不及今之文体洒脱，更为近年来研究性书刊中独特，值得一读。

纵观全书，不论史实引据，思辨形成，观今释读，仅为一家言，难为定论，尚待专家、学者共同探讨。

高兆忠

目 录

第一卷 行走山西觅常家	1
第一章 山西、山西人	3
第二章 山西商人	10
第二卷 茶叶之路看常家	35
第一章 中国茶叶	37
第二章 武夷岩茶	47
第三章 茶行江西	64
第四章 万里茶路的新起点	68
第五章 船到汉口	86
第六章 逆行汉水	94
第七章 襄阳、樊城	97
第八章 唐白水道	104
第九章 赊店老镇	106
第十章 九朝故都	119
第十一章 渡黄河、登太行	125
第十二章 初入山西	131



第十三章 晋商故里	136
第十四章 北出雁门	146
第十五章 西路商	150
第十六章 繁华的东口	158
第十七章 多伦淖尔	174
第十八章 草原自然路	184
第十九章 外蒙古、蒙古人	188
第二十章 茶到恰克图	197
第二十一章 俄国商人	204
第三卷 茶路之余论常家	215
第一章 茶路的选线	217
第二章 茶路的影响	222
第三章 中国文化远播俄罗斯	232
第四章 茶路的衰亡	235
第五章 茶路家族	244
参考文献	296
后记	299

第一卷

行走山西觅常家

wanli chalu
hua changjia



第一章 山西、山西人

山西，一个多山的内地省份，70%以上面积都是山地，以位居太行山以西而得名。

远在旧石器时代，山西就有人类活动。从旧石器时代的芮城西侯度文化和匼河文化，至襄汾县“丁村人”文化遗址，证实了人类在山西大地上生生不息的延续。早在10万年前，汾河流域一带不仅有古人类繁衍生息，而且形成了早期的原始氏族，成为以汉族为主体的中国人的主要发祥地之一。

旧传“尧都平阳（今临汾），舜都蒲坂（今永济），禹都安邑（今运城）”，由此可知，在原始社会部落联盟时代，晋南一带是部落主要的活动区域。周王朝时被封为晋地，山西简称由此得名。三家分晋之后，属赵、韩、魏。秦统一后置太原、河东、上党、雁门、云中、代等郡，初步形成以黄土高原东部为区域的行政区划。以后，汉为并州，唐为河东道，宋为河东路，辽属西京道，元属中书省，明置山西布政司，至清始定名为山西省。

政区名称及境界虽数次变革，但划界却久已形成，即西南以黄河为界，向东则以太行山分割。成为中国北方经济、政治、民风、民俗方面相对独立的地域。

中国历史是多民族文化交会而成的，以汉族为主体的农耕文明与北方游牧文化的对峙便是其中之一。

从秦时的匈奴起一直到清初，这种对峙除了少部分能和睦相处外，多数情况下则以战争为最后的解决方式。山西处在北部边陲，数千年来一直是民族矛盾的前沿地带，自然成为战争多发的区域。历史上各朝所修筑的长城，在山西境内总会找到其中一段，而雄关险隘之多也为全国之最。

战争对于交战的双方来说，胜者为王败者寇，意味着双方土地、人口、财富的占有和丧失。对于经历战火的人民，却是遭遇一场又一场的灾难。据有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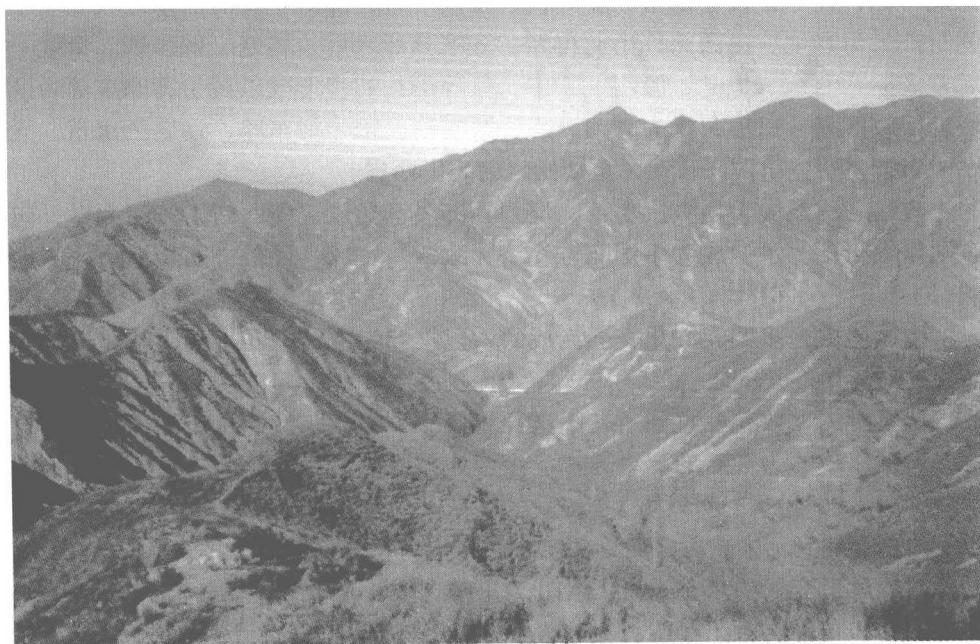


专家统计，从秦初到清末，平均每 30 多年，山西境内便会有一场战事，尽管规模不等，破坏力也不尽相同，但战争结束后所带来的满目疮痍却毫无二致。

然而生命并不因战乱而停息，繁衍并不因灾难而结束，战争间隙就是重建家园、重建自己生存和发展的新的城镇、村庄的过程。遥远的祖训和眼前的现实，使多数山西人明白，他们不可能也不存在一劳永逸的乐园，只能在不断的破坏—建设中争取相对的安适。历史和现实孕育了山西人顽强不屈的地域性格。山西农民，特别是山区农民，其吃苦精神是少有的。他们在非常恶劣的自然环境下，以分散零星的土地获得一次次丰收，使之成为中国北方一个杂粮省份。即以抗日战争期间著名的“小米加步枪”而言，那长长的米袋里，至少有一半小米出自山西。

频发的战火，锤炼了山西人不畏艰难、吃苦耐劳、坚韧不拔的精神，也树立了威武不屈、敢于扶正匡邪的品质。早在 1000 多年以前就已遍传欧美，被称为“中国第一大悲剧”的赵氏孤儿的故事就发生在山西。故事讲述了为救忠良之后，8 位地位悬殊、年龄不同、经历各异的仁人志士，不约而同地做出了“慷慨轻生、刚毅任侠”的选择，最终战胜邪恶。与之同代的另一位贤士介之推，

太行山间路



曾随年轻时的晋文公重耳长期流亡，累有功勋，但在文公登位之时却隐身而退。宁遭火焚而不愿出山。足见山西人重义扶弱，不计个人得失的传统古已有之。

山西人性格中的另一特点是包容。前已谈及，这块土地上历经无数次战争，有一部分是北方少数民族与汉族之间发生的，山西则往往处于战争的前沿。而这种以侵占掠夺为目的的争斗，却无形中改变了民族间老死不相往来的状况，增进了相互了解，进而取长补短。

这里不仅有游牧民族向农耕文明的学习和迈进，也有汉民族吸纳其他民族优点的事例。战事频发的战国时代，统治山西的赵武灵王，在观察了胡人的军事装备之后，大胆进行了改革。令军士卸铠甲，穿袍装，骑马射箭，使原来贫弱的赵国变成七雄中一支不可小视的力量，史称“胡服骑射”。

战争的另一影响是人口的迁徙。这种迁徙或是一方实力强大，足以造成震慑；或因某一方内部冲突、分裂，这种变数在历史上也不鲜见。如东汉时北方的匈奴部族便分南北二部，以后北匈奴大抵西迁，以扩大其游牧范围。而南匈奴则依附东汉，还帮助抗击北匈奴进犯。张捷夫《山西历史札记》中谈到：“匈奴久居塞内，长期过着比较安定的生活，人口日益增多，在建安二十一年（216年）七月，而匈奴单于呼厨泉入朝的时候，曹操把他留在邺城，而使右贤王去卑监其国，监国仍居平阳，同时将南匈奴分为五部，分居并州诸郡：左部一万余落（户），居于太原故兹氏县（今汾阳市）；右部六千余落，居于祁县；南部三千余落，居于蒲子县（今隰县）；北部四千余落，居于新兴县（今忻州）；中部六千余落，居于大陵县（今文水）。”

这一次迁民几乎可以说是遍及全省了，粗看似属于政府之举，而客观上则反映出广大南匈奴人向农耕文明靠拢的强烈愿望。

在山西历史上，这种自觉自愿的迁徙虽然也有，但更多的则是由战乱引发的人口变动。东汉三国以后，中国北方进入一个混乱的时期。随着晋政权的被迫南迁，开始了“五胡乱华”的时代。各种各样的游牧部落进入山西。由于战争掠夺的原因，汉民族和他们总是处在一种对峙中，屠杀、压迫、掠夺是征服者的一贯暴行，而被压迫者的反抗也不时发生。再加上少数民族内部矛盾，政权更迭，几经辗转，最后由拓跋氏建立的北魏统一了北方，成为一个相对稳定的政权。

北魏之所以能够强盛一时，是与其统治者能审时度势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有关。特别是其领袖魏孝文帝，更是这一改革的有力推动者和统治者。

拓跋氏属于鲜卑族，是匈奴人的一支，因其国内有鲜卑山而得名。多年来



一直游牧在内外蒙古草原一带，后族力日强，趁秦王符坚南征失败，国内大乱之际，进兵取代。后不断平定一些小国，扩大疆土，占有从东海到甘肃河西走廊一带，西南占有今江苏、安徽、湖北、四川的一部分。

为了尽量弥合战争带来的民族间的仇恨，增进民族间的团结、融合，他们建都平城（今大同），并以其为中心，实施了一系列政治、经济和文化等改革措施，大力提倡农耕，实行均田制度，规定凡十五以上人丁均可获得耕地，促进了农业发展。更为重要的是他们所推行的鲜卑汉化国策，也可算是空前绝后的。这一运动由魏孝文帝推向了极致。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改姓氏。皇室方面身体力行，“魏人下诏，以为北人称土为拓，后为跋。魏之先出于黄帝，以土德王，故为拓跋氏”（见《资治通鉴》）。上行下效，于是改姓几乎遍及全族。据《魏书》所记，所改姓氏多达一百多种。因“北人重同姓，多通谱系”（顾炎武《日知录》）。过上几代谁也难分什么种族了。

二是提倡各族间相互通婚。这也是首先由皇帝娶汉人开始，北魏约40%的皇后是汉族女子。王公、官吏以及民间通婚更是习以为常。

三是通用汉语。这中间是有一个过程的。北魏初定时，有些人为了攀附贵族，尝谓“我有一儿，年已十七，颇晓书疏。教其鲜卑语及弹琵琶，稍欲通解，以此伏事公卿”。但是到了后来，情况大变。

“太和十有九年（495年）六月，诏：‘不得以北俗之语言于朝廷’”。自上而下的变革，实际是顺应了一般鲜卑军民先前“皆以夷语，后染华俗，多不能通”（《隋书·经籍志》）的社会大趋势。

此外还有服饰的汉化。官制、官名、制官顺序的更新，以及民俗民风的倡导，终于使鲜卑这个民族名称在历史上彻底消失。

站在历史的今天，重新审视那发生在1600年前的壮举时，除了对他们肯于承认落后，全盘地、无条件地接受异族文化的决策而倍加钦佩时，随之产生的思索是：北魏的帝王，为什么独独选中山西来作为他们改革的始发点，并进而推广向所有辖区呢？

“五胡乱华”所带来的破坏是严重的，鲜卑人虽政权在握，人口又大批进入山西，但同原住民比较起来还是少数。政府希望他们能尽快融入汉民中，这方面山西人表现出了由衷的大度。他们虽然对那些破坏家园的入侵者的记恨未平，但对远道迁来的和自己一样的百姓，却不以异类相斥，他们友好地接待了这批外来者。教给他们先进的农业、手工业技术，使其安下心来，成为这片土地上的新居民。这种由官方推广的鲜卑汉化进程，从史书上看，在山西基本上没有

受到什么阻力。

反观同一时期，由北方各府、州（包括山西）南渡的大量人口，在进入江南后却遭到当地人“拒而不纳之势”。一直到数十年后还难融入其间。

南北朝只是历史上一个比较集中的民族同化的过程，其实在整个山西历史上，汉族一直都在与其他民族进行着不断的融合。元朝时蒙古贵族入主中原，山西是他们主要的迁入地。元政权稳定后山西直属中书省，下辖大同、北宁、晋宁三路。在此期间，山西农业、手工业发展迅速，与元军马蹄所至，赤地千里的其他各省有很大不同。

有学者将元代山西繁荣的原因归结为有两位相对开明的蒙古官员。他们是察汗帖木儿和扩廓帖木儿，他们虽然在政治压迫上同整个元朝保持一致，但同时提倡发展生产，老百姓得以休养生息。从《元史》和《明史》中的确也能找到一些相应的记载。况且扩廓帖木儿本名王保，不过是蒙古人的养子，似乎也应当更通一些汉族的人情。细致分析起来，似乎也不尽如此。因为其二人先后任中书省平宰，是一个相当高的职位，基本上相当于副宰相。而中书省所辖有山东、河北、山西和内蒙古西部以及河南、江苏、安徽的部分地区。在这其间何以独独山西省能受益，而其他地区继续遭殃呢？可见这至少不是最主要的原因。

真正的原因恐怕是山西人对异民族一种自觉同情感，以及他们对环境顽强的适应能力。在有条件的情况下，以发展生产、增加收入、改善生活为第一要务。应该说是他们的包容性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由于农业条件较好，对外来人口不加歧视、排斥，使山西成为外地人迁徙的主要选择地。以榆次为例，如果从民国初年居民算本籍的话，现有人口中近一半属外迁入者。城东五里许的源涡村，仅2000余人口，便集中了全国半数的省区和100多县市的籍贯，在全国农村中也是罕见的。

这种民族间、地域间的不断融合，也一定程度上形成了对民风民俗的影响。如现在在忻州、定襄、原平一带百姓中盛行的摔跤运动，历史悠久，是否有从蒙古民族的摔跤聚会中脱胎而来的影响，也值得探讨。

山西人的另一个性格特点是他们的一种机变性。这种表现较为复杂。在中国漫长历史进程中，曾爆发过无数次农民起义，其中规模较大，足以震撼朝纲，甚至带来改朝换代的也不下十几次，毛泽东同志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一文中曾说：“从秦朝的陈胜、吴广、项羽、刘邦起，中经汉朝的新市、平林、赤眉、铜马和黄巾，隋朝的李密、窦建德，唐朝的王仙芝、黄巢，宋朝的宋江、

方腊，元朝的朱元璋，明朝的李自成，直至清朝的太平天国，总计大小数百次的起义，都是农民的反抗运动，都是农民的革命战争。”只要稍加留意便可发现，这些反抗运动大多发生在山西的周边，但没有一次是从山西境内直接爆发和发展起来的。

农民起义之所以发生，理论上说是阶级矛盾高度激化的结果，通俗而言即天灾加暴敛，让农民实在是活不下去了，才有官逼民反。如前所述，山西是一个旱涝有收成的地方，人民生活虽艰辛，但除特殊年景，饿死人的现象较外地为少，勉强生存的条件还是有的。山西的地主所占有的土地比江南财主少很多，大的土地拥有量，一般不过是数百亩，几十顷的庄户就十分罕见了。地佃双方的关系比较固定，收租雇佣中也时常出现些许人情。特别是明清以后，大多数地主均兼营生意，土地剥削已不是他们的主要追求了。且不言各县的旧志上所记，每逢灾年有开明人士放粮、舍饭之举。以抗日战争时期为例，根据地推行“二五减租”，在山西的推行要比其他处顺利得多。作家邓友梅曾谐趣地总结为：“山西人比别处容易活下去，造反的劲头也就差了点。埋头生产，不大搞武装起义。”是比较符合事实的。

另一方面，农民起义的初期，往往凭借一种封建迷信来号召，有的甚至本身便基于一派宗教，同时常常用一种似是而非的言词相号召，如东汉黄巾的：“苍天已死，黄天当立，岁在甲子，天下大吉。”这种词句，在似懂非懂的农民中往往最具有诱惑力。总之，要用这些手段给人以天命所归、大业必成的影响，故而容易取得振臂一呼而应者云集的效果。

山西人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自然也是迷信的。据有关资料显示，中国现在能称为文物遗址的地面建筑，约有70%在山西，而这些建筑绝大多数是寺庙。这中间既有五台山集中展现的佛教院群，也有晋南芮城永乐宫道教瑰宝。古刹名寺，遍及全省，迷信氛围与其他地方毫无二致。只是山西人的观念中可能更偏重于现实：为避黄土高原干旱，而处处建龙王庙以求雨；祈人丁兴旺，而拜膜送子观音；盼金榜题名，而祭祀孔子、文昌……最典型的是把财神定位在关羽——山西人最为尊重的偶像，重义、轻财、威武、忠君都随着大量关帝庙的修建而深入人心。甚至于昏君当朝，也认定是上天对万民的惩罚，渡过此劫，自有光明。这种理念极大地牵制了造反念头，其他异教邪说，自然难以动摇了。

山西人是机变的，乐观的，现实的。宏观而言，缺少了东北人的粗犷、京津人的世故、南方人的精明，很难产生风云一代的伟人和空前绝后的悲吟；但是这种以曲折委婉地保全生命、含辛茹苦般缓进的人生态度，也不失为历史长